

# 中蒙劃界史迹初探(上)

## ——「同志加兄弟」的博弈

● 劉曉原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即面臨着同北方鄰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複雜的雙邊關係。本文指出，歷史遺產、意識形態、國際環境、民族關係等錯綜的因素，伴隨着脫胎於清代統屬體制的中蒙關係發展，使之從一種彼此界限不明的新型國家關係架構，經歷由「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到相互猜忌、仇視的變化，終歸落入一般現代國家關係的窠臼，雙方在1962年簽訂邊界條約。在此過程中，對再現歷史記憶的孜孜追求、對國際大同的朦朧嚮往、對冷戰國際陣營利益的有限服膺，以及各自與蘇聯關係的差異，導致中蒙政府對雙邊關係的走向和正常性各有理解。1962年劃定邊界，標誌着中蒙關係在近現代領土屬性轉型的意義上走入正軌。同時，在雙方各自秉持的政治理念裏，這條邊界線體現更多的，卻是相互加深的敵意。

**關鍵詞：**領土屬性轉型 兄弟國家 中蘇分裂 中蒙邊界 民族關係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五節。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面臨的所有邊界問題中，中蒙邊界問題十分特殊。與中蘇、中印、中越等邊界不同，中蒙邊界並沒有發生引人注目的衝突。然而，中蒙邊界問題具有中國同所有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所不同的鮮明特點。首先，這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方才出現的邊界問題，開始於1945年

\* 本文所利用的俄國、蒙古檔案，是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周邊國家研究院沈志華教授領銜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第二期子課題「蒙古國中蒙關係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的同仁整理、翻譯的。參與這項工作的有北京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王浩教授、劉迪南副教授和袁琳講師，上海大學歷史系哈日巴拉講師，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曉亮副教授、金泉和白林講師，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崔海智副教授、谷繼坤講師、烏仁其木格助理研究員等。康奈爾大學博士研究生王安然為整理本文涉及蒙、俄檔案的註解提供了幫助，特此致謝。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其次，這個問題在1949年以後包含了極其複雜的邊界理念，集國際、黨際、族際（民族/族群）的內涵於一體。最後，1960年代中蘇分裂以後，中蒙邊界成為冷戰時期最具戰略意義的邊疆地區之一，不但蘇聯陳重兵於蒙古，內蒙古自治區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中國國內唯一重劃區界的省區。

由於材料匱乏，比之於中蘇、中印、中越等邊界問題，中蒙邊界問題較少受到學界的注意。本文所反映的，只是對中國、蒙古、俄國檔案材料的初步梳理，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探討只能點到為止，觀點也不成熟。全文的着力點，在於拓寬對中蒙邊界問題的理解，試圖說明中蒙邊界問題的解決，不僅取決於中、蒙、蘇三國政府在冷戰時期的外交決策，更是近現代中國領土屬性轉型和東亞國際關係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 一 官方研究

儘管學界對中蒙邊界問題研究較少，但是官方在不同時期還是做了詳盡的內部研究。目前可以看到中國方面的研究資料有三種：第一種是1963至1965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組織有關軍區和省區黨委編纂的中蘇、中蒙邊界問題的多卷資料；第二種是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在1989年編輯的資料，其時改革開放已歷十年，冷戰也接近尾聲，但中蘇關係尚未解凍；第三種資料成稿於1993年，編輯者的背景不詳，但從資料的「內部」定位來看，顯然也有官方背景<sup>①</sup>。這些資料對於中蒙邊界形成的描述是一致的。

簡言之，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以後，中蒙雙方對於邊界線有不同看法，蒙古主張以當時的蘇製地圖為準，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堅持以中國對內、外蒙古的原行政區劃為準<sup>②</sup>。中蒙邊界的最後劃定，完成於1962年10至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舉行的邊界會議，以及12月簽署的《中蒙邊界條約》。當時雙方各自的「建議線」基本一致的邊界約為2,450公里。通過兩次會談，雙方解決了有爭議的三十二個地區的歸屬，共涉及16,329平方公里；劃歸中國的約5,620平方公里，佔爭議地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強，劃歸蒙古的10,709平方公里，是爭議地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弱。《中蒙邊界條約》簽訂以後，兩國邊界全長為4,672.7153公里，同蒙古臨界的中國省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甘肅和新疆，其中內蒙古與蒙古的邊界為3,105.7683公里。這些資料表明，解決爭議的依據是歷史和當地居民的經驗，雙方磋商後各自做出了讓步<sup>③</sup>。至於為甚麼中蒙兩國在領土面積上達成如此結果，以及這些得失各具甚麼樣的經濟和地緣戰略意義，在下篇的有關討論裏會有涉及。

在這些正式、詳盡的官方研究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是否還有研究中蒙劃界問題的必要？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上述資料的編纂基於從1960到1990年代國內外政治環境幾次急劇變化而衍生的不同政治理念。從今天的眼光來

看，這些研究對中蒙邊界問題的發展並沒有提出一個歷史的解說。其次，這些研究依據的只是中國單方面的信息，對蒙古、蘇聯方面的一些重要情況缺乏實證的研究，甚至對中方的情況也只是做了有選擇的說明，並沒有展示有關歷史過程的全貌。隨着相關國家檔案的公開，現在則可以對有關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以下是現存官方研究中，對有關歷史過程提出的幾個相互矛盾的解說例子。

第一，對外蒙古獨立的描述。1960年代的資料完成於中蘇分裂時期，對蘇聯有強烈的譴責意味，稱：「正當中國人民處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蘇聯竟背着中國人民於10月11日將唐努烏梁海併入蘇聯版圖。……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背着中國人民，把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名義上讓它獨立，實際上歸蘇聯控制。」<sup>④</sup>1989年的資料則選擇了一個更早的時間點，結合了中共黨史敘事，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正當性，稱：「1924年11月8日，外蒙古召開人民大呼拉爾會議，正式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國民政府未予承認。後來，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發表宣言（即《三五宣言》）認為，外蒙古獨立符合外蒙古人民擺脫反動統治與民族壓迫的正當願望。」<sup>⑤</sup>1993年的資料基本上迴避對1921年以後的外蒙古獨立作出價值判斷，而是只講史實，對從清代到中共建國這段時期的外蒙古事務，作了較詳細的綜述<sup>⑥</sup>。

第二，對中蒙邊界屬性的描述。1960年代的資料特意指出，在1949年以後，中蒙邊界的屬性發生了急劇轉變：「四十多年來，蒙古人民革命黨在蘇赫巴特爾和喬巴山的領導下，團結外蒙古人民在爭取人民革命勝利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鬥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從澤〔澤登巴爾〕修集團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以後，蒙古人民革命黨已蛻化成修正主義的黨，蒙古人民共和國已倒退為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專政的國家。……蒙古已成為蘇修的附屬國和殖民地。」<sup>⑦</sup>換言之，在1960年代，中蒙邊界問題是被置於「階級國家」的理念框架裏來理解。在蒙古「變修」以前，中蒙邊界是兩個「兄弟國家」或「兄弟黨」之間的連接；在蒙古「蛻變」為中國的「階級敵人」以後，中蒙邊界也就變成了一條「階級鬥爭」的戰線。在這種理念下，考慮的就不僅僅是主權國家的邊防問題，而是「敵我」之間的階級力量對比。這種階級力量對比，甚至包括了對中蒙邊界的中國一側邊境居民的「階級成份」考量<sup>⑧</sup>。資料表明，中方在1960年代是有打仗的準備的：「在目前修正主義份子大肆反華的情況下，誰要想憑藉武力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僅在蘇聯人民中通不過，就是在廣大士兵群眾中也是通不過的。今後不管事態的發展如何，我們只有保持高度的警惕，隨時作好準備，以便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sup>⑨</sup>

相比之下，1989年的資料則反映了文革以後政治理念的變化，不再提及「階級鬥爭」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在回溯1949年以後的歷史時，資料描述了1950年代中共在邊境地區「慎重穩進」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當時中蒙兩國互為「兄弟國家」在邊境合作的情況。1950年代中蒙的邊防安排，並不是針對對方，而是為了共同對付美帝國主義。對於1960年代雙方出現的緊張局面，資料是這樣說的，「由於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上出現分歧」，蘇聯奉行「大國沙文主義」，而蒙古「跟隨蘇聯反對中國」；「蘇蒙兩國調兵遣將，

進駐中蘇、中蒙邊界前沿，虎視眈眈，嚴重地威脅着我國安全」；邊境「由和平友好，『互通情報，對付共同敵人』的邊境變成蠶食與反蠶食，顛覆與反顛覆，策反與反策反，是非多端，氣氛敵對的邊境」。與此同時，中蒙邊界的中國一側，由於文革爆發和在內蒙古發生的「挖肅」運動，公安邊防體系從上到下「全部解體」。資料特別提到，1979年中越戰爭期間，「蘇、蒙為支援越南，以我為背景，在邊界對面大肆進行軍事演習，飛機、坦克、大炮晝夜隆隆，大有入侵我國之勢」<sup>⑩</sup>。

至於1993年的研究資料，雖然產生於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但是對邊界問題已經採取了一種常態的國家管理的態度。資料表明，對1960年代被稱為「階級異己」的社會成份，實際上還有另一個名稱，即所謂「特種人口」（1949年）或「重點人口」（1951年以後）。在1973年以前，一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殘餘勢力」都被視為「重點人口」；對此類人口的監管在文革時期受到破壞。1973年以後恢復了對「重點人口」的管理，但定義發生了變化，即「側重其現實表現，不再以其反動歷史身份定論」，而凡是「現實危險份子」，均列為「重點人口」，進行「幫助教育或秘密監控」。至於與北方鄰國的關係，資料指出，「80年代後半期，中蘇、中蒙的國家關係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緩和狀況，互相間的經濟貿易有很大發展，敵對狀態漸漸化解」。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早年「兄弟國家」關係已經恢復。在新形勢下，蘇（俄）、蒙的情報活動仍然頻繁，民族主義、宗教勢力的煽動滲透活動明顯增多。蒙古仍有人散布「三蒙合併，建立統一的蒙古強國」一類的危險思想<sup>⑪</sup>。

第三，對1960至70年代中蒙邊界緊張局勢的解釋。無論是中蘇分裂時期的1960年代還是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上述三種研究都把中蒙邊界緊張的原因歸咎於蘇聯和蒙古方面。一般的說法是，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蒙古政府「跟隨蘇聯反對中國」，一方面利用內、外蒙古的「民族和階級的關係及地理條件，用對付敵人的手法，勾結我方具有嚴重地方民族主義情緒的人和反壞份子及其原來對付日本的老情報人員進行各種顛覆破壞活動」，另一方面沿邊境布置重兵，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sup>⑫</sup>。與此相關的是中蒙邊界的劃界過程，在1950年代中蒙友好時期，蒙方主動提出撤回邊防軍隊，僅由雙方的邊防站處理沿邊境上的偶發情況。但後來因為雙方人畜越界和其他生產活動頻繁引起的麻煩和誤解，蒙方又在1957年提出劃界。在以後幾年中，由於雙方對於邊界是否在歷史上已經劃定意見不一致，劃界談判沒有進展。在中蘇、中蒙關係惡化以後，由於邊界事件時有發生，中方在1962年4月提出解決劃界問題，最終雙方在12月簽訂了邊界條約<sup>⑬</sup>。

這些在短短三十年內發生幾次變化的歷史敘述，說明中蒙關係和中蒙邊界問題，即使在官方敘述中也還沒有定論。有一些基本問題尚待解答，比如，究竟應該如何評判外蒙古獨立的歷史？對這個問題，國民黨/中華民國和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不同時期都有各自公開和不公開的立場。那麼作為歷史研究，對這些立場應如何做出充分的說明和評判？又如，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中蒙之間的邊界屬性？中蒙兩國各自經歷了巨

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形態轉型，與之相關的國際大環境也幾經變化。在不同時期，利益相關的中、蒙、蘇政府和邊境居民，歷經中蒙之間若即若離的模糊狀態、「有邊無防」的友好狀態、壁壘森嚴的敵對狀態，以及循章管理的正常狀態。因此，對不同時期的中蒙邊界屬性，顯然不能簡單地定義為一般的「國家邊界」。那麼，這種發展變化反映的又是一條甚麼樣的歷史路徑？再如，1960至70年代中蒙邊界的緊張局勢，為甚麼並沒有因為1962年《中蒙邊界條約》的簽訂而有所緩和？中蘇分裂的大局勢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這是唯一原因嗎？在中國周邊的亞洲共產黨國家中，蒙古真的與朝鮮、越南不同，只會「跟隨蘇聯反對中國」嗎？即便如此，蒙古對蘇聯的追隨究竟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還是出於地緣政治或民族政治的原因？對於這些問題，從現在可以看到的檔案文獻中尚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本文提出的，只是對有限的檔案文獻研判後得出的初步印象。

## 二 「大蒙古」和「大中華」

所謂中蒙邊界問題，可以從點、線、塊的意義上來討論。「點」即雙方邊境上存在爭議的地點，「線」即對整條邊界線的勘劃，「塊」即大片乃至整個族群/民族地域的歸屬。1945年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地位與實際狀態不符，由是無從解決「點」、「線」的問題。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為獨立國家的程序，在法律意義上解決了「塊」的問題。不過，當時的中、蘇、蒙政府對邊境的「點」、「線」問題各執一端，只能留待未來解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蒙雙方對劃界中的「點」、「線」問題仍有歧義，但是這些歧義並未成為不可克服的障礙；給兩國、兩黨關係帶來困擾的，反而是似乎已經解決的蒙古民族和地域的歸屬問題。換言之，中共建國後，使得中蒙革命政黨的關係疊加於中蒙之間發展不久的國家關係之上；在一段時間裏，源於共產主義的國家關係理念，對兩國之間遠未成熟的民族國家關係造成干擾；1945年確定的中國對外蒙古獨立的法律承認，又在「階級解放」、「民族自決」、「兄弟黨」、「社會主義陣營」等理念的干擾下變得不那麼確定。這些干擾在兩國領導人的觀念中的具體表現，分別是對「大蒙古」和「大中華」的政治訴求。

在中共建國之前，蒙古領導人一直懷有建立一個統一的大蒙古國的夢想。在1945年中蘇談判期間，蒙古總理喬巴山（Хорл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就曾向蘇聯官員表示，蒙古「國家獨立」的含義，也應該包括把內蒙古從中國人的壓迫下解脫出來。最後，中蘇談判確定了外蒙古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獲得中華民國政府對其獨立承認的程序。蒙古領導人對此表示了極大的失望，他們所希望的蘇聯對華外交的結果，是實現蘇聯政府向來表示支持的蒙古「領土完整」，即內、外蒙古的合併，而不是蒙古「在現有邊界內」，以投票的方式確認已歷時二十多年同中國的分離。在蘇聯同蒙古領導人多次溝通以後，喬巴山等人勉強同意，中蘇談判對中蒙邊界問題的諒解是「一個必要的，同時也是臨

時的步驟」，而蒙古真正希望得到的邊界線，也就是內、外蒙古合併後的領土，可以暫時「擱在腦子裏」<sup>⑭</sup>。

但是，喬巴山並不想消極等待。在1946年2月同斯大林的一次會面中，他表示希望通過宣傳鼓動，使中國境內的蒙古人脫離中國並加入蒙古。斯大林告誡說，這只可以「悄悄地進行」，否則會引發同中國的戰爭<sup>⑮</sup>。1946年初，針對在蒙古政界和民間廣為流行的「未能實現的大蒙古夢」，蘇聯駐蒙古使團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據使團觀察，所謂「大蒙古」思想，有形形色色的對文化、民族、地緣等因素的不同考慮。有一種極端的主張認為，蒙古國應該將邊界推至長城一線，以便掌控大批漢族人口，作為發展蒙古經濟的廉價勞動力。但是此時的喬巴山，對於在嚴酷的國際環境下通過內、外蒙古的合併來建立一個獨立自強的大蒙古國的想法已經幻滅。他實際希望的是讓內、外蒙古的三百萬蒙古人口一起加入蘇聯，使蒙古能夠有足夠多的人口和地域，同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平起平坐<sup>⑯</sup>。

在其後幾年內，圍繞着內蒙古自治問題，蒙古、中共、國民黨政府、蘇聯及至美國之間，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sup>⑰</sup>。1949年後，蒙古政府依然保持着對內蒙古地區蒙古族的特殊關切。但是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裏，沒有關於1952年喬巴山去世以後「大蒙古」思想在蒙古繼續流播的信息<sup>⑱</sup>。相反，俄國檔案顯示，在1949至1950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內出現了一種強烈的意見，認為喬巴山關於內、外蒙古合併、「恢復統一」的思想是過時和落後的；為蒙古的發展前景計，只有盡早加入蘇聯，才能改變蒙古「大大地落後於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狀態。據稱，後來成為喬巴山繼任人的澤登巴爾（Юмжагийн Цэдэнбал）也有這樣的想法<sup>⑲</sup>。但是在1956年4月蒙古黨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保持蒙古的獨立狀態。這或許表明蒙古黨內對國家前景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sup>⑳</sup>。至於1949年以後，在內蒙古是否仍然存在着「大蒙古」思想，根據目前的材料尚難定論。文革時期對內蒙古自治區區委第一書記烏蘭夫和所謂「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揭發材料」，自然不足為據，但是1949年以後內蒙古的民族政治問題，尚待仔細研究<sup>㉑</sup>。

與「大蒙古」思想相對的，是中共的「大中華」思想。「收復外蒙古」的理念在中共黨內是長期存在的，在1949年和整個1950年代，中共領導人先後五次在不同場合向蘇共領導人提出外蒙古問題。第一次是學界所熟知的1949年2月毛澤東同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在西柏坡的談話<sup>㉒</sup>。至於其後幾次包括1950年毛澤東訪蘇期間、1954年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ев）訪華期間、1956年米高揚訪華期間，以及1957年周恩來訪蘇期間的談話<sup>㉓</sup>。在1972年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一次談話中，周恩來確認，在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同斯大林談判期間，中方提出了要把蒙古包括在中國的「大家庭」裏，可是遭到了蘇方的反對<sup>㉔</sup>。關於1956年4月米高揚訪華期間同中共領導人談話的情況，俄國的解密檔案有所披露。當時，周恩來向米高揚提出，兩黨在1949年2月就外蒙古問題交換意見時，斯大林的觀點和「黨的原則」不一致。劉少奇則表示，「中國人民對蒙古脫離中國很痛心，……中國人民把蒙古看作是和台灣一樣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談話結束時，周恩來和劉少奇表示，並不是現

在就要把蒙古合併到中國，這可以留待以後再說，但是此時有必要表達出「中國人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sup>⑳</sup>。有關1954和1957年談話的直接史料，目前還沒有看到。

每次中蘇兩國領導人就外蒙古問題交談之後，蘇方都會把談話的內容傳達給蒙古政府。因此對蒙方來說，中共領導人對外蒙古獨立的看法從來就不是秘密<sup>㉑</sup>。但是，中方首次對外界公開自己的想法，是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的講話。毛澤東說：「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1954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幾個月後，總參在組織編纂中蒙邊界資料時，基本上照搬了毛澤東的原話<sup>㉒</sup>。根據李丹慧的研究，在中蘇關係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此時中共針對蘇聯的安全戰略思考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的談話是中共第一次向外界宣示，中蘇之間存在着領土爭議。這在國際社會尤其是在蘇聯引起了劇烈反響，並可能因此導致了當時中蘇邊界談判的破裂<sup>㉓</sup>。

毛澤東的談話對中蒙關係自然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共領導人就外蒙古問題與蘇方交換意見時，向來認為所謂外蒙古問題就是蘇聯的政策問題。現在所見到的史料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1960年代中蒙關係破裂之前，雙方直接討論過外蒙古回歸中國的問題。在一些重大場合，中共領導人與蒙古領導人對話的基調，是推動「革命國家」之間針對帝國主義的團結。比如，蒙古政府代表團在1952年中國國慶期間訪問北京，毛澤東在談話中盛讚蒙古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幫助。毛澤東表示，「蒙古人民取得自由的時間長，有經驗，我們要向你們學習。我們的後方有蒙古、其後還有蘇聯，蒙古、蘇聯、中國的關係更加團結了」，並進一步強調中蒙之間的共性，說大家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徒弟」<sup>㉔</sup>。

在談話中，蒙古代表團團長澤登巴爾提到：「1945年戰爭後，國民黨在承認蒙古獨立的問題上，提出了全民公投的條件。所以舉行了全民公投。」此話引出毛澤東的一個妙問：「蔣介石承認蒙古獨立了嗎？」隨後的情形在蒙方的檔案裏是這樣記載的：「對此，當尤·澤登巴爾說到『蒙古人民都願意獨立』時，大家都笑了起來。」之後，毛澤東又加上一句更妙的評論：「國民黨是聽美國指揮的。他要求公投，是美國人的意思。」<sup>㉕</sup>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並沒有特意重申，他本人同斯大林在1950年初談妥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承認了外蒙古獨立。這次中蒙兩黨領導人有關外蒙古獨立的對話雖然簡短，但是雙方的「笑」，特別是毛澤東的明知故問和指東打西的評論，卻給歷史研究者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

到了1960年代，中蒙之間的革命團結不復存在，中共對外蒙古的獨立問題也不再一笑了之。在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談話公布以後，24日，中國外交部為周恩來起草了一個應對蘇方可能的詢問的提綱，其基調是堅決批判蘇聯自斯大林以來在歐亞大陸擴張領土，違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奉行「列寧所痛恨的大國沙文主義」<sup>㉖</sup>。而中共對待可能來自蒙方的質詢，則有一個方針上

的調整。7月底，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外交部要求中國各駐外機構，在「蒙古大使可能在蘇修授意下要求我澄清毛主席談話中有關外蒙古部分」時，「不要與他糾纏，可說當時我不在場，但我認為，雅爾塔會議背着中國決定蒙古的命運，中國是不滿意的。如問中國是否要收復外蒙古領土，可答現在中蒙兩國的關係大使是清楚的。不談歷史，不講我們現在的態度，也不說將來如何，這樣可保持很大主動權」<sup>②</sup>。

對歷史研究而言，周恩來用模糊策略來「澄清」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以便在蒙古歸屬問題上保持「主動權」的做法，是了解此時中共領導人立場的一個佐證。蒙古駐外使節是否向中方進行了詢問，目前不得而知，但是蒙方的反應是毫不含糊的。據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向外交部的報告，9至10月間蒙古的報紙、廣播以「按語」、「讀者來信」和蒙古通訊社聲明的形式，對毛澤東的談話進行了「惡毒攻擊」，共計八十多篇。蒙通社的聲明說：「中國領導人早就把蒙古看作是中國的一部分，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曾不斷企圖把蒙古變成中國的一個省，要取消蒙古的獨立，這種企圖同蒙古人民的兇惡敵人中國軍閥、地主和國民黨反動派事實上沒有甚麼區別。」<sup>③</sup>

其後，多半是出於孤立「蘇修」的考慮，中國外交部指示駐外機構在蒙古歸屬問題上，對歷史和現狀要有不同的表態<sup>④</sup>：

關於外蒙古問題，我可表示，外蒙古在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為一系列的中俄條約和1924年中蘇協定所肯定。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同美英一起，背着中國人民，把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名義上讓它獨立，實際上歸蘇聯控制。在中國被反動派統治的情況下，為了防止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對蘇聯的侵略，這樣做儘管不對，在當時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以後，蘇共領導還堅持這種做法，這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這是過去的事。至於現在，我們承認現狀，我們同蒙古簽訂的邊界條約就是證明。如果有人指責我企圖剝奪蒙古獨立，佔領蒙古，我可表示：現在剝奪蒙古獨立和佔領蒙古的是蘇共領導，不是中國。

這樣，毛澤東1964年談話的一個附帶效果，就是在譴責蘇聯在歷史上分割中國領土的同時，表明了對外蒙古獨立「承認現狀」的立場。但是，只要中共領導人繼續將外蒙古獨立歸咎於蘇聯的「說不過去」的做法，而不從蒙古民族政治訴求的角度來接受作為鄰國的蒙古，中蒙之間的歷史情結便總是會處於一種扭曲甚至對立的狀態。

進入1970年代以後，中國的外交戰略發生了重大調整，開始同西方國家合作以抗衡蘇聯。在以後一段時間裏，中國領導人在向西方國家表述來自蘇聯的威脅時，經常以蒙古為例，說明蘇聯對中國犯下的歷史罪過和持續的惡意。例如，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期間，鄧小平在向他表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時，講到自己在小時候即從課本裏學到，中國的版圖是「桑葉」形的，而在蘇聯把外蒙古從中國奪走之後，「桑葉」不復存在了<sup>⑤</sup>。

1989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訪華時，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與外蒙古成為中美之間的一個話題。鄧小平對布什說：「我希望你可以從地圖上看到，蘇聯把外蒙古從中國割去以後，中國成了甚麼樣子，我們的戰略地位變得十分糟糕。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記得中國的形狀像一片楓葉。可是現在，你可以從地圖上看到北邊缺了一大塊，楓葉被啃掉了。」鄧小平解釋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就是利用這個戰略態勢，對侵華日本展開了致命的鉗形攻勢，而從赫魯曉夫掌權開始，蘇聯又利用同樣的態勢對中國進行包圍<sup>⑥</sup>。同年5月，中蘇關係開始正常化。鄧小平又向來訪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Михаил С. Горбачев)指出：「通過包括雅爾塔協定和同國民黨簽訂的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俄國人從中國搶走了三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包括原屬於中國的，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sup>⑦</sup>以上鄧小平的講話內容都是轉譯自英文文件，與原話可能有不符之處，比如「桑葉」和「楓葉」都異於中國近現代政治話語中形容中國「完整」版圖的「海棠葉」。這種差異是鄧小平自己造成的還是翻譯過程造成的，並不重要，因為他要表達的意思是前後一致的，反映的是1949年以後，特別是1960年代以後形成的一個中共主導的「大中華」話語體系。

### 三 有債必償

從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建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對外蒙古的態度經歷了從「階級鬥爭」立場向「國家關係」立場的轉變過程。上面的討論說明，這個轉變過程對中共領導人來說並非順理成章，而是尷尬和曲折的。在1950年代，中國多次向蘇聯表達收復外蒙古的意向，卻屢屢碰壁。同時，中國在同蒙古的雙邊關係中盡施懷柔，以爭取蒙古向中國靠攏。從現在解密的檔案裏可以看到，中共試圖通過貿易、援蒙、文字改革等途徑，加強對外蒙古的影響。這一策略引起了蘇聯的強烈猜疑，而蒙古當局則是另有因應。

首先造成蘇聯疑慮的是中蒙貿易關係的發展。1956年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的一個報告提出，雖然中國領導人在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但這並不是他們真正的看法。報告對中蒙貿易的狀態頗感憂慮：「中國對外貿易組織為在蒙古購買的許多商品所支付的價格比蘇聯對外貿易公司更高，而同時賣給蒙古的中國商品價格要比蒙古從蘇聯買到同樣這些商品的價格更低。」報告認為，只有消除中國領導人對蒙古歸屬問題的不合理想法，並且「要能組織好合作並協調好蘇聯方面和中國方面對蒙古的援助」，才能避免中蒙關係的不良發展<sup>⑧</sup>。

只是中蘇協調並不容易，因為蒙方也有自身利益的考慮。蘇聯駐華大使館1956年的工作報告提到，在過去幾年裏，蒙古與中國的貿易發展得特別快，從1951到1956年幾乎增長了八倍。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國家中與中國貿易額取得很大增長的唯一國家」。關於蒙古對華和對蘇貿易

差價的問題，報告提到中蒙兩國的貿易組織在1956年達成一項協議，「取消了過去貿易中所存在的價格不正常情況」<sup>⑳</sup>。但是實際上，情況並沒有立刻發生變化。1957年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的報告指出，中國在蒙古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已佔15%以上。同時，在蒙古對外貿易中出現了一個零和現象，即「由於蒙古出口能力的局限性，只得靠縮減蘇蒙貿易規模來發展它與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貿易」。蒙古增加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貿易的積極性在於，「人民民主國家為蒙古大部分出口商品支付了比蘇聯更高的價格」。報告特別提出中國對蒙古實行的優惠價格政策，並稱這已造成對蘇聯不利的政治後果，使蒙古內部的敵對份子得以利用這種情況來進行破壞蘇蒙友誼的宣傳<sup>㉑</sup>。

蘇聯所擔憂的這種情況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背景。在1952年中蒙兩國政府簽訂經濟和文化合作協定的時候，毛澤東和澤登巴爾有過這樣一番對話<sup>㉒</sup>：

毛澤東：美、英等帝國主義始終在剝削着殖民地和弱小國家。例如，我們給錫蘭出售的白米是一噸54美元，而美國是賣80美元，資本家就是如此剝削小國的。

澤登巴爾：資本主義地區始終是在相互競爭，剝削小國。他們就如大魚吃小魚，利潤就是一切，把帝國主義都消滅了才好呢。

毛澤東：你說得對，我同意！比如，錫蘭就曾派代表來我國，要同我們建立貿易關係。我們的米價比美國便宜三分之一。他們每噸米賣80美元，我們是54美元，相當於22英鎊。我們的香蕉也便宜，一噸才22英鎊，美國卻是32英鎊。我們的貿易部剛同錫蘭簽訂了貿易協定。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是，我們把社會分為兩個階級。從各國的情況來看，都分為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分為兩個派，比如，以美英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及以錫金、緬甸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大國在剝削小國。……危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在共產黨領導的民主國家，絕不存在爭奪市場的矛盾，我們之間是物品的交換，資本家之間的爭奪變得愈益激烈了。而且，由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特別是蒙、中等國的人民建立了自己完全獨立的國家，加深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衝突是長期存在的。

毛澤東對諸如大米、香蕉的價格這樣的細節如此熟悉，顯然是事先特意做過了解。雖然他向蒙古代表團說明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行為的區別，但是在後來幾年中，中國對蒙古的貿易政策突顯的是中國與蘇聯的區別：中國不是「大國在剝削小國」。

1950年代，中國在同蒙古的經濟關係中奉行「幫助」政策。這種「幫助」不是一般國際關係中的經濟援助，甚至有異於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援助。這是一種在中共特定的歷史理念下的「幫助」行為。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對蒙古領導人做過這樣的表示：「中國

人三百年來剝削蒙古人，欠了蒙古一大堆的債。所以當中國站穩後，蒙古就可以要求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中國將在三百年內償還蒙古的債。」<sup>48</sup>1958年底，周恩來在同蒙古政府代表團談話時，採用了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為蒙古的未來描繪了一個美好願景<sup>49</sup>：

我們有義務幫助蒙古，從歷史上比起來我們欠債欠得多。……歷史上你們也處在一個不利的地位，我們漢人築了長城不讓你們向南邊來，而且還把你們往北邊趕，趕到大沙漠的苦地方，好地方都被漢人佔了。……現在我們經濟建設發展了應該償還你們，毛澤東主席講過這叫還債，過去中國商人高利貸剝削了你們，今天我們加倍奉還。我們應該幫助你們，將來我們科學發展了還會有更大的幫助，如把沙漠變成綠洲，有水有樹，科學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與毛澤東的「三百年」框架不同，周恩來講的「歷史」顯然是清代以前，那時的「蒙古」並無內、外之分。周恩來對「蒙古」的說法，反映了1950年代中共對內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策之間的某種聯繫。總之，中共領導人講到的「歷史上的剝削」和今後的「還債」，暗示的都是用新的方式延續中蒙在歷史上的關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還債」和「幫助」也是1950年代中共對國內少數民族政策的重要概念。比如，1953年8月，周恩來同華北、內蒙古地區領導人談及規劃綏遠併入內蒙古自治區的問題，提出「承認自治當然就要幫助少數民族發展、進步。漢人得天獨厚，開風化之先，先進就應該幫助落後」<sup>49</sup>。同年10月，毛澤東對到京參觀訪問的幾個藏區代表團強調：「西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發展，主要靠西藏的領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幫助。」<sup>50</sup>1957年8月，周恩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對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以及「還債」和「幫助」概念做了充分的說明。在講話中，周恩來把獨立多年「並且背後有一個蘇聯的幫助」的蒙古，看作是一個既沒有發展又沒有改變經濟基礎的失敗案例<sup>51</sup>。蘇聯對蒙古「幫助」的失敗，不僅與中共「幫助」國內少數民族發展的方針形成對照，而且也是未來中國取代蘇聯成為蒙古發展主要助力的根據。換言之，對中共而言，1950年代的中蒙經濟文化關係並非國家之間的一般交往，而是修復中蒙歷史上源遠流長的關係，並對蘇聯進行競爭的重要途徑。

## 四 彼此之間

蒙古對中國「還債」式的「幫助」政策，大概是懷有一種憂喜參半的心情。在1958年同蘇聯駐蒙古大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的一次談話中，蒙古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曾德表示，在獨立了三十多年以後，原來落後的蒙古在最近幾年發展得更快一些，這得益於所有朋友的全力支持

持，也包括「情況有點複雜」的「南面鄰居」，即中國<sup>④</sup>。所謂「情況複雜」，表述的是蒙方對中共領導人意圖的擔憂。其實，在當時的中蒙經濟關係中，雙方都是相互猜忌和各有所圖。這在中國的援蒙人員問題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1950至60年代，援蒙人員問題，即中國以提供勞動力的方式援助蒙古建設，是中蒙之間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1960年代末，蒙古外交部的一個內部報告這樣概括說<sup>⑤</sup>：

中國領導人以給我們提供勞動力為契機，從1955年開始將漢人移居我國，組織採取延長漢人在蒙古工作期限，禁止派遣蒙古族工人到蒙古工作，敦促漢族工人與蒙古公民結婚等措施，企圖使中國工人成為蒙古公民。這一謀略以幫助增加我國人口為藉口，得到穩步而有力的推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以後把在內蒙古實行的對蒙古族的漢化策略擴展到我國做好準備。不過，我國政府及時發現了中國領導人的謀略，並採取了有效對策，使得他們的謀略沒有成功。

顯而易見，這是在中蒙關係惡化以後，蒙方對中國派遣工人援蒙的一種「陰謀論」敘述。問題的定性往往隨着觀念的轉移而改變。1960年代末，在中蘇分裂的背景下，蒙方的觀念已經帶有強烈的仇華、恐華色彩。因此，上述引文體現的主要是蒙方在仇華理念下對有關事實的一種解說。

不過，在1950和60年代，「民族關係」一直通過援蒙人員問題在中蒙之間時隱時現，所以也不能將蒙方的指責簡單地說成是無端的污蔑。谷繼坤的研究大概是目前對有關歷史情況所做的最詳盡的探討<sup>⑥</sup>。只是該文對中蒙之間族際關係的討論，僅限於指出蒙方在接受和安排漢族工人時的疑慮，以及中方拒絕蒙方關於大量派遣內蒙古的蒙族人員赴蒙援建的要求。實際上，援蒙人員問題恰恰反映了1950年代中蒙之間國際、黨際、族際關係交織的複雜情況。一個需要提出的問題是，中方究竟是否懷有一種意圖，即希望通過大量派遣漢族工人赴蒙，藉以改變中蒙關係的性質或結構？目前的資料僅能勾勒出雙方有關交涉的一個大致情況。

中國援蒙人員的派遣是海外華工大歷史的一部分。但與歷史上一般的旅外華工，甚至與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互派技術、勞務人員有所不同，中蒙雙方在中國援蒙人員問題上的行為，都具有「復土主義」(irredentism)的成份<sup>⑦</sup>。前述「大蒙古」和「大中華」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蒙兩國政府對援蒙人員政策的制訂。就如中共領導人在1950年代一直懷有收復外蒙古的願望一樣，蒙古領導人同樣懷有盡量吸納蒙古境外的同族人的願望。對雙方來說，中國援蒙人員的派遣或許是實現彼此願望的一個機會。這裏提出一個帶有悖論意味的假設：1950年代中蒙之間基於意識形態的「兄弟國家」或「兄弟黨」關係，使得雙方都沒有放棄將對方的領土或人民納入自己的「民族統一」的訴求；而隨着1960年代中蘇分裂後中蒙黨際關係的惡化，反而成為重新構建中蒙之間正常的「國家關係」的必要前提。1960年代以後中蒙的敵對狀態，消除了雙方對同一陣營的歸屬感，也終止了相互之間對領土和人民的統一訴求。

這是對中蒙關係在冷戰期間發生變化的一般假設。對中國援蒙人員問題的求證，可以為這個假設提供一個例證。

中共建國之初，中蒙雙方即開始商討中國向蒙古提供勞動力援助的問題。以中國之有餘補蒙古之不足，最初顯然是互惠互利的做法。但是在雙方的討論中，援蒙人員很快就具有了變相移民的色彩。以勞動力援蒙的主意出自中方，而中國援蒙人員在蒙古定居則是蒙方的要求。1954年11月，烏蘭夫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率領中共代表團出席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期間，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向烏蘭夫提出，希望中國的援蒙工人可以作為永久居民留在蒙古<sup>⑤1</sup>。次年，在雙方進一步就有關問題進行磋商時，蒙方又提出要求，中國工人的「工期越長越好，甚至定居下來」<sup>⑤2</sup>。中方對這個要求也欣然接受。1958年，周恩來在同蒙古政府代表團的一次談話中表示：中國工人「留下增加你們的人口，我們同意」<sup>⑤3</sup>。

發生於1950年代中蒙之間的「援助」式移民動議，是「大蒙古」與「大中華」思想博弈的一種特殊形式。這場博弈的開場鑼，是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同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團的談話。迄今見到的有關這次談話的材料有三種：(1) 中方公開發表的談話記錄；(2) 蒙古檔案裏的一份簡單紀要；(3) 俄國檔案裏蒙方向蘇方的有關轉述。

根據中方記錄，在毛澤東同蒙古代表團長、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達姆巴(Дашийн Дамба，又譯丹巴)的談話中，談到蒙古經濟發展問題時，鼓勵蒙古牧業向定居改變，同時要發展農業、水利。毛澤東強調，發展水利工程，「財力還不算那麼重要，最重要、最要緊的是人力」。根據毛澤東當時了解的情況，蒙古共有80萬人口。他提出的中國人力援助格外慷慨：「以後在農業方面，我們可以用人力援助你們，其數目可以是10萬，也可以是20萬，甚至可以達到30萬。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幫助你們搞牧畜業。〔引文中的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sup>⑤4</sup>

在會談後的第三天，蒙古駐華大使奧其爾巴特(Пунсалмаагийн Очирбат)向烏蘭巴托發回一份會談紀要。這個紀要在傳達毛澤東談話的一個要點時，在措辭上與中方的記錄有所不同。在蒙古大使的紀要裏，毛澤東說：「我們可以派遣10至20萬工人。如需要牧民也可以去。你們與內蒙古建立關係，如需要也可以建立合作組織。」<sup>⑤5</sup>

當時參加會談的另一個蒙古官員是曾德。他在1958年2月向莫洛托夫轉述了毛澤東的談話，其中有關中國人力援助的內容，與上述兩個文件不相同：「毛說，三百年來，中國人欠了蒙古很多的債。中國將滿足蒙古的要求，來償還三百年來的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向蒙古提供20萬名勞動力和10萬名畜牧工人。〔曾德說〕我們那時請求，從內蒙古給我們提供15,000名畜牧工人。但是，同中國領導人會談後，這一建議被拒絕了。中方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從內蒙古提供畜牧工人，〔作為替代方案〕中方願意以任何數量的中國工人作為交換。」<sup>⑤6</sup>

上述三種材料的劃線部分，差別十分明顯。在中方公布的材料裏，毛澤東確實鼓勵蒙古與內蒙古建立文化聯繫，但在講到援蒙人員時並沒有表示向

蒙古輸送蒙族牧業人口的意思，只是說在援蒙的幾十萬農業人員中，有一些人可以幫助蒙古發展畜牧業。而來自蒙古和俄國的檔案材料則顯示，毛澤東的談話涉及兩類援蒙人員，即「中國工人」和「內蒙牧工」。曾德的事後陳述似乎表明，在同毛澤東會談後，蒙方又就牧工問題同中方進行了專門的溝通，但沒有結果。毛澤東在1956年會談時究竟是怎樣說的，有待於中國檔案的進一步解密。但是在中國政府拒絕向蒙古輸送內蒙古的牧業人口這一點上，雙方是沒有誤會的。蒙方資料顯示，毛澤東在1957年5月20日致信蒙古領導人<sup>⑤</sup>：

您所希望的將一批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遷徙至蒙古人民共和國定居，這是一件很難辦的事情，內蒙古自治區870萬人口中漢族人口佔700萬左右，蒙古族人口卻只佔100萬。正因為如此，給蒙古國派遣勞動力與技術支持這一工作，我國計劃只能對漢族人進行宣傳和倡導。依照我們的計劃，近幾年每年派遣幾千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們認為漢族人無法用蒙古語溝通，對你們生活和風俗習慣無法適應，會比較複雜麻煩的話，那麼我們這方輸送少數工作人員或不輸送都可以。

雖然中共領導人作了如此明確的表態，蒙古政府在以後幾年中依然十分執著地試圖吸納境外、主要是中國的蒙族人口。1962年12月，澤登巴爾到北京簽署《中蒙邊界條約》，其時中蒙關係已經惡化。即使在這種氣氛下，澤登巴爾仍然當面向周恩來再次要求從內蒙古向蒙古輸送人口<sup>⑥</sup>：

目前，我們的勞動力需求量很大。周恩來同志您昨天提到我國需要提高人口數量。我知道您不止一次地提到過有效利用工人的問題。我們希望你們能給補派按協定應提供工人數的空缺部分。這是我們雙方的相關機構會同解決的問題。考慮到語言溝通方面的因素，空缺部分也可以從內蒙古徵召嘛。我們是不會在意的。這是實際工作的需要，不是出自民族主義的考慮。如您所知，幾年前，我們黨中央曾致函貴黨中央，希望從中國遷移一定數量的蒙古族人口。當時提的人數是十多萬。但是，當時你們回覆說只能給提供少數的翻譯人才，不可以遷移蒙古人口。也許貴國有自己的難處或有特殊原因。我們不知道這個難處或特殊原因是甚麼。我相信你們不會把我的上述要求看做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考慮。

談話中提及的所謂「語言溝通」問題，指的是當時在蒙古的中國工人與蒙古當局之間發生的一些糾紛。語言障礙是國際勞務輸出的題中應有之義，發生於中蒙勞務關係中毫不奇怪，但這應該不是蒙古當局力求從內蒙古輸入蒙族人口的原因。中蒙之間出現的所謂勞務人員問題，除了蒙古確有對勞動力的需求以外，其實就是中蒙雙方都十分明白的「民族人口」問題。如前所述，用吸納內蒙古人口來擴大蒙古的人口總量，是二戰以後蒙古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澤登巴爾急於撇清蒙古方面的要求和「民族主義」的關係，聽起來像是此地無銀之辯。1964年，蒙古領導人堅持不懈，再次正式要求中國政府「從內蒙

古派遣畜牧業方面的一部分勞動力支援我們」。這次提出的數字是派遣一萬牧民到蒙古居住和工作，為期三到五年或更長時間<sup>⑤9</sup>。但這個要求依然是毫無結果。

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際關係的一個特徵，就是各個執政黨的政策行為，經常表現出國際主義理念和民族主義訴求之間的糾結與矛盾。對於蘇聯來說，「國際主義」往往是維繫其在陣營內部主導地位的一個說辭。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國際主義」則常被用來作為本國尋求某種歷史公正和獨立地位的根據。中蒙之間有着漫長複雜的歷史，雙方在相互關係中尤其會強調自身行為的「國際主義」正當性，同時又無法擺脫同民族主義的干係。1950年代中國的援蒙政策，自然是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的。1955年中國國務院就動員工人赴蒙援建下發給有關省市的指示這樣說明援蒙的意義：「蒙〔古〕30年來在蘇聯幫助下在經濟文化建設等成績突出，但是，蒙〔古〕缺乏人力和技術，本着加強中蒙兩個〔國〕人民友好互助的精神，對於蒙〔古〕的困難，給予同情和幫助。這是我國人民的一個具有崇高國際主義精神的光榮任務。」<sup>⑥0</sup>

在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氛圍裏，用「國際主義」的「光榮任務」來動員國內一般勞動群眾遠赴他國，自然在情理之中。但在前述毛澤東同蒙古領導人的談話中，他提議向總人口不足百萬的鄰國輸送二十至三十萬的漢族移民，就顯得過於慷慨了。對蒙古領導人來說，如此巨大數量的漢族移民絕難接受，就像中共領導人不能接受向蒙古輸送中國的蒙族人口一樣。北京和烏蘭巴托相互之間既不能接受對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國際主義」，同時又猜忌對方的「民族主義」打算。這種尷尬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蒙早已形同兩國，殊非一家，但是在「共產主義國際關係」的模糊願景之下和冷戰時期陣營政治的框架裏，兩國領導人往往把兩國的事情當成自家之事來辦。

中方對蒙古的移民動議，必然引起蘇方的注意。蘇聯駐華大使館1956年的工作報告提到，「中國同志具有向蒙古遷移很大一批中國公民的計劃」，但由於蒙古政府的「含糊立場」，雙方對這個問題尚無定論<sup>⑥1</sup>。蘇聯領導人從這裏嗅出了令他們不安的味道。1956年2月，在澤登巴爾和米高揚之間有一次關於蘇聯援蒙問題的談話。米高揚告誡蒙方，在鐵路等基本建設方面，不要寄希望於仰仗昂貴的蘇聯工人；同時，蒙古應該造就自己的工人階級，不應打算從中國搬來一個工人階級。米高揚也向澤登巴爾詢問了蒙古和內蒙古的關係，而澤登巴爾則表示除了文化關係以外，別無其他<sup>⑥2</sup>。

以後蘇方又持續了解到中方對蒙古人口問題的態度。比如，在1959年10月末的一次談話中，中國駐蒙古大使謝甫生對莫洛托夫說，蒙古人口稀少是國民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大阻礙，不增加人口就無法指望蒙古的變革會產生重大成果，而中國可以幫助蒙古擺脫這一困境<sup>⑥3</sup>。後來莫洛托夫又從澤登巴爾那裏了解到，在1960年5月周恩來訪問蒙古時，隨同訪問的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同蒙古官員談話時提出，蒙古應該盡快發展人口，「為了更快地推動蒙古的社會主義建設向前，蒙古的人口應至少不少於1億人」。據說，當時蒙古領導人都對陳毅的說法感到震驚，並表示不能同意<sup>⑥4</sup>。

如前所述，1960年代後期中蒙關係破裂以後，蒙古政府選擇性地忘記自己積極尋求內蒙古移民的歷史，而將中國對蒙古提供勞務援助的政策稱為「民族主義」的「謀略」。於是，中國領導人在195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支持中國勞務人員在蒙古定居的表態，也就變成了蒙古當局揭露中國「陰謀」的證據。值得注意的是，蒙方吸納內蒙古人口的企圖比較容易解釋，但是中方的政策動機就不那麼簡單；大概不能一言以蔽之，或界定為中國政府所弘揚的「國際主義精神」，或看成是蒙古當局所譴責的「民族主義謀略」。目前，中國檔案史料的開放情況還不足以讓歷史研究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在這裏僅提出值得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蒙古人口（勞動力）問題的考察要有足夠大的歷史時間框架。近現代以來，人口稀缺一直是蒙古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時至二十一世紀，蒙古仍在設法解決人口增長的問題<sup>⑥</sup>。在1949年以前，清政府和蘇聯當局在蒙古的不同經營，都對蒙古人口的發展趨向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評判中共領導人在1950至60年代對蒙古人口問題的態度和政策，應該採用自清代以來蒙古社會經濟發展的較長的歷史框架，這樣可以比較中共與清政府及蘇聯在相關政策方面的異同<sup>⑦</sup>。

第二，對中共領導人政策理念的複雜性要給予充分考慮。中蒙歷史關係的繼承與中斷、中國向現代國家形態的轉型、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理念、冷戰陣營的國際態勢、中國國內少數民族政策和跨界蒙族問題的關係，以及對內政外交的通盤考慮，等等，都可能是影響中共的勞務/人口援蒙政策的因素。

第三，對中共的蒙古移民政策的研究，還需要同中共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移民政策進行對比。這樣的比較研究可能會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例如，從1958年底到1959年底，北京應朝鮮政府要求，共向朝鮮輸送了一萬多戶、五萬多人口<sup>⑧</sup>。到了1963年，中國政府又把向朝鮮移民的問題提到反對「蘇修」的高度，要求相關各省、區做好工作，以加強同朝鮮的團結<sup>⑨</sup>。據沈志華的研究，中國向朝鮮輸送朝鮮族人口，從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即已開始。這種移民政策既帶有對朝鮮的「民族關懷」，又帶有反帝反修的「國際主義」。但是從長遠來看，北京在朝鮮族人口問題上表現的「慷慨」，對中國自身邊境地區的穩定並非有益<sup>⑩</sup>。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對蒙族人口的「吝嗇」。至於箇中原因，尚待史料完備以後的進一步研究。

## 五 「新」、「舊」有別

與貿易和移民問題相比，內蒙古的文字改革問題，在中蒙關係中並沒有引起任何爭吵，但實際上更為敏感。蒙古使用多年的斯拉夫化的蒙文，在蒙古的民族認同、文化教育和國際溝通諸方面的功能，論者均有述及<sup>⑪</sup>。對這種「新蒙文」的利弊無論怎樣評價，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它是蘇聯對蒙古控制、影響多年的結果。同時，新蒙文也是表明蒙古與內蒙古不同的現代發展道路的最重要文化符號。由於筆者不具備研究蒙古文字近現代發展問題

的能力，在這裏只能提請學界注意，在1949年以後有關中蒙關係的檔案裏，這個問題顯示出相當的重要性。

1956年毛澤東同蒙古代表團的談話裏提到了文字問題，只是在這個問題上，中蒙之間的「幫助」關係反過來了。達姆巴告訴毛澤東，由於「新文字」的使用，現在蒙古的成年人都識字了。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賞，並說內蒙古也在那樣做。達姆巴的回應是：「在文字方面，我們可以幫助內蒙古。」毛澤東對此頗為讚許，並鼓勵蒙古與內蒙古建立「直接聯繫」<sup>①</sup>。這次談話顯然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次年4月，蘇聯大使館向國內報告說：「〔中蒙〕兩國在文化領域合作發展順利。該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是，過去一年裏，中國同志對發展內蒙古自治區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直接文化聯繫給予了特別大的關注。比如，1956年訪問蒙古的大多數中國文化代表團均來自於內蒙古。赴中國的部分蒙古文化代表團同樣也只限於參觀內蒙古自治區。」<sup>②</sup>

但是，蒙古政府幫助內蒙古引進新蒙文的方案很快就中途夭折。在蘇聯和蒙古專家的幫助下，內蒙古、新疆分別從1955和1956年開始，逐步試行推廣斯拉夫化的新文字<sup>③</sup>。按照參與該項工作的蘇聯專家謝爾久琴柯(Г. П. Сердюченко)的論證，在內蒙古用西里爾新蒙文取代「舊蒙文」的益處有三：中國可以立刻分享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語和蘇聯布里亞特語的出版物；可以從蘇聯獲得先進的印刷、打字設備；尤其是可以避免其他方案如文字拉丁化帶來的弊病，即「人為地把中國蒙古人跟那些在社會政治、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已經達到高度發展階段的蒙古人隔離開來」<sup>④</sup>。然而，到了1958年，蘇聯專家提出的內蒙古在物質和政治文化方面都向北傾斜的論證方式，被中共轉換成了一個向南、向漢族靠攏的論證，其中心目的就是實現蘇聯專家所認為會產生弊病的文字拉丁化。1958年1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的一次報告會上提出<sup>⑤</sup>：

漢語拼音方案可以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如果幾十個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這不僅對於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交流經驗是個障礙，而且印刷、打字、電報的設備勢必各搞一套，對於各民族今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發展極其不利。許多兄弟民族都表示這樣的願望，就是要同漢族在字母上取得一致，以便於交流文化、學習漢語和吸收漢語的名詞術語。……漢語現在既然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字母，那就應該確定這樣一條原則：今後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

在周恩來講話之後，內蒙古、新疆先後於同年3月和6月終止了文字的斯拉夫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很快就按照周恩來講話的宗旨，制訂了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拉丁化的改革方案，而內蒙古則乾脆停止了文字改革。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一面在全區掀起一個學習舊蒙文的熱潮，一面對急於同漢族「融合」和輕視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傾向展開批評<sup>⑥</sup>。烏蘭夫親自掛帥，指責「有的蒙古同志還認為學習蒙文是狹隘民族主義，用處不大。甚至有的把不學習

蒙文自認為是『積極』，……而這種『積極』是裸體跳舞，是脫離群眾的，必須徹底糾正」<sup>⑦</sup>。

蘇方當時的觀察是，中國政府在1957年末或1958年初決定停止引進新蒙文的各項工作，是因為在新疆和內蒙古的一些「地方民族主義者」將文字斯拉夫化變成了同中共中央抗衡的工具<sup>⑧</sup>。蒙方則認為，中國領導人改變做法的目的是隔斷中國的蒙古族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聯繫。其實，1950年代蒙古同內蒙古文化關係的增進還產生了另外一種效果，就是引起蒙古的一些知識份子甚至黨政領導人，主張在蒙古恢復舊蒙文<sup>⑨</sup>。

迄今見到的國內學者的有關研究，都將1950年代末以及後來在內蒙古和新疆文字改革中出現的反覆，歸咎於所謂中共政策的「極左」偏向或中蘇關係惡化的影響<sup>⑩</sup>。1957年下半年，中共在進行反右運動時，確實在少數民族地區也開展了一場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整風運動。但是在中共認定的「地方民族主義」的幾個主要表現當中，並沒有涉及文化教育方面<sup>⑪</sup>。烏蘭夫大力提倡舊蒙文，在當時也沒有被貼上「地方民族主義」的標籤。顯然，在中國的有關檔案解密之前，不可能對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字改革政策，尤其是涉及同蘇、蒙比鄰而居的內蒙古和新疆的情況，做出切實的分析。

然而，以上簡述顯示出，內蒙古的舊蒙文改革牽涉到太多的問題，中、蒙、蘇當局都有利用各自的文字改革方案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明確意向。在中共內部，在位居北京的中央和內蒙古地方政府之間，也進行着民族政治的博弈。因此，本來似乎是民族身份天然標誌之一的語言文字，在中國「不斷革命」的年代，變成了改革的對象，並且是一種可以按需要而調整的政治模具。對外，蒙文改革擔負着塑造中國及內蒙古同蘇、蒙的政治文化關係的重任；對內，蒙文改革與否及其走向，又變成了衡量內蒙古民族同漢族、同中華民族關係的一個尺度<sup>⑫</sup>。

總之，文字、文化交流和勞務交流一樣，是中蒙之間試圖相互滲透、影響的領域。不同的是，勞務交流導致在蒙古的中國工人捲進了一些法律糾紛、罷工事件，甚至造成人命傷亡，而文化交流則可以在學術討論甚至載歌載舞的平和氣氛下進行<sup>⑬</sup>。1962年12月中蒙兩國簽訂邊界條約期間，在周恩來和澤登巴爾之間有過一次有關文字改革的對話，摘錄如下<sup>⑭</sup>：

周恩來：我們是兩個鄰邦，有傳統關係，所以有共同的話語。這在有文化關係的國家之間是很正常的現象。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因同蘇聯有廣泛的聯繫，你們就學習了他們的經驗，導入了新的文字字母。這使得蒙古文中有了很多蘇聯科學技術詞彙。同樣的道理，內蒙古的蒙古文中也有很多漢文的名詞術語，也因此在外蒙古的蒙古文中出現了不少互不關聯的名詞術語。

澤登巴爾：語言不會成為蒙古人的障礙。我們的舊蒙古文歷經幾百年，很好地履行了其歷史使命，但現在有點趕不上發展的要求了。所以，我們就導入了新字母。

周恩來：雖然導入了新字母，但蒙古語文還是給保存了下來。內容上有甚麼新的充實和革新沒有。

澤登巴爾：現在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路上。這需要各國在語言文字上要發展共性，並最終要在世界範圍內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

周恩來：每個國家都需要從對方的語言文字中汲取營養。發展共產主義的新文化，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我們準備用拉丁字母標註漢字。不過，這需要下大功夫。

兩位領導人這番談話的意識形態框架是共產主義大同。澤登巴爾顯然自詡蒙古在共產主義陣營「書同文」的方向上，比中國佔有更領先的地位。而此時雙方對共同意識形態的解說已經發生歧義，中共領導人對蒙古在蘇聯卵翼下的社會發展也早有微詞。1950年代，在蘇聯、中國、蒙古、內蒙古之間一度存在着一種內外不明、你我不分的「兄弟關係」。而此時，中蒙兩國之間領土的「硬界限」——國家邊界——已經確定。在周恩來看來，兩國之間文化的「軟分野」也應與國家邊界一致，內蒙古和蒙古的文化發展各有中心，就像各自文字的拉丁化和斯拉夫化一樣，相互之間漸行漸遠。而澤登巴爾則另有見解，相信「蒙古人」文化內涵的整體性。

本文所立意討論的中蒙邊界問題，由於清代以後遺留的領土和民族問題，因而在中國同所有鄰國的邊界問題中極具特殊性。以往有一種說法，即中蘇分裂及其附帶的中蒙關係惡化是把「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sup>⑥</sup>。其實，從近現代國際政治的角度看，民族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平、仇視乃至戰爭，都是「正常」的國家關係的不同狀態。在1950年代中、蒙、蘇三國之間的黨際關係處於「正常」狀態時，中蒙之間的國家關係卻處在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正常」狀態，所涉及的就是所謂領土「板塊」或民族歸屬和民族認同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國之中成立最晚，在歷經十年以後，三國之間由最初的「兄弟黨」的相互熱情轉而反目成仇，而三國之間的國家關係卻因「兄弟分家」而開始正常化，標誌性的發展就是確定中蒙兩國各不相屬的邊界線。（未完待續）

### 註釋

① 第一類為內蒙古軍區編：《內蒙古軍區兵要地志》（內部發行，1963）；《蒙古人民共和國兵要地志（中蘇、中蒙邊境資料第三分冊）》（內部發行，1964）；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內蒙古軍區編：《中蘇中蒙內蒙古中段邊境我區情況（中蘇、中蒙邊境資料第九分冊）》（內部發行，1964）；總參情報部編：《中蘇、中蒙邊境情況彙編》，下冊（內部發行，1964）；瀋陽、內蒙、新疆軍區編：《中蘇、中蒙邊境蘇蒙邊防軍情況（中蘇、中蒙邊境資料第五分冊）東段》（內部發行，1965）。第二類為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邊防局編：《內蒙古公安邊防史料，1950-1985》（內部發行，1989）。第三類為齊煥祥、章文權主編：《八千里邊防》，內部資料（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 ② 當代中國人習慣沿用清代用語，稱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為「外蒙古」，以別於中國境內的內蒙古。本文敘述照例，但凡用「蒙古」處，皆指獨立的蒙古國。
- ③ 《內蒙古軍區兵要地志》，頁7；《內蒙古公安邊防史料，1950-1985》，頁3、6-7；《八千里邊防》，頁34-37、41。1960年代資料的說法與毛澤東1964年7月接見日本一個代表團時的講法基本一致，而所謂中國堅持以內、外蒙古「原行政區劃為準」的說法是不符合當時情況的，詳見下文。
- ④⑦ 《蒙古人民共和國兵要地志》，頁21-23；23。
- ⑤ 《內蒙古公安邊防史料，1950-1985》，頁5。
- ⑥ 《八千里邊防》，頁30-34。
- ⑧ 資料對中國邊境地區的黨、團員和民兵所佔的人口比例，以及白俄、布里亞特人、哈拉哈人、喇嘛、四類份子、歷史遺留的日美蔣特務和爪牙的人數，都做了詳細的統計。參見《內蒙古軍區兵要地志》，頁11、79-80、97-98；《中蘇中蒙內蒙古中段邊境我區情況》，頁2、27、42-43。
- ⑨ 《中蘇、中蒙邊境情況彙編》，下冊，頁32。
- ⑩ 《內蒙古公安邊防史料，1950-1985》，頁160-67、184、141-44、197、229-31、241。「挖肅」運動即「挖出與肅清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運動，是文革期間發生於內蒙古的一場波及甚廣的政治迫害。
- ⑪ 《八千里邊防》，頁270-21、313、375-76。所謂「三蒙」，即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蘇聯境內的布里亞特蒙古人。
- ⑫ 《內蒙古軍區兵要地志》，頁11；《蒙古人民共和國兵要地志》，頁22-23；《中蘇、中蒙邊境蘇蒙邊防軍情況》，頁6；《內蒙古公安邊防史料，1950-1985》，頁184；《八千里邊防》，頁35。
- ⑬ 《內蒙古公安邊防史料，1950-1985》，頁6-7；《八千里邊防》，頁35。
- ⑭ 〈伊萬諾夫與喬巴山會談記錄〉（1945年7月5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6, оп.7, п.38, д.560, л.4-5；〈伊萬諾夫、普里霍多夫致洛佐夫斯基〉（1945年11月22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27, п.193, д.2, л.15-21。
- ⑮ 〈斯大林與喬巴山會談紀要〉（1946年2月22日），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ф.558, оп.11, д.352, л.87-90。
- ⑯ 該數字來源於檔案，但當時內、外蒙古的實際人口應低於三百萬。參見“Excerpts from a Report by the Head of the Soviet Mission in Mongolia I. Ivanov to Moscow” (12 January 1946),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2506>。
- ⑰ 參見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⑱ 〈契爾沃年科與沙拉夫會談紀要〉（1960年8月26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53, п.454, д.9, л.10-15；〈蒙古駐中國大使館提供的報告材料〉（1967年5月29日），МУГХТА（蒙古國外交部中央檔案館），ф.5, д.2, х/н.366, х.1-20。
- ⑲ 〈普里霍多夫給葛羅米柯的報告〉（1950年9月13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32, п.215, д.3, л.17-26。
- ⑳㉑ 〈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的報告〉（1956年7月28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48, п.268, д.39, л.2。
- ㉒ 參見楊海英編：《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4) 毒草とされた民族自決の理論》（東京：風響社，2012）。
- ㉓ 關於1949年中共與蘇聯秘密互訪的情況，參見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180-87。
- ㉔㉕ 喬冠華：〈周總理對蘇聯代辦談蘇聯佔領鄰國領土問題的提綱（稿）〉（1964年7月2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1295-01。
- ㉖ “Record of the Third Meet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Tanaka and Premier Zhou Enlai” (27 September 197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228>.

- ⑳ “Information Memorandum, ‘About the Claim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ith Regard to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30 January 196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098>.
- ㉑ 〈莫洛托夫與曾德會談紀要〉(1958年2月7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40, п.252, д.5, л.126-35。在這次談話中，蒙古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曾德向蘇聯駐蒙古大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歷數中共領導人1949年以來提出的收復外蒙古的問題。
- ㉒ 〈毛主席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日本社會黨中、左派人士的談話記錄〉(1964年7月1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 105-01897-01;《蒙古人民共和國兵要地志》, 頁21。後者實際根據的是7月24日外交部整理過的毛澤東講話, 個別語句與7月10日的〈談話記錄〉有所不同, 參見喬冠華:〈周總理對蘇聯代辦談蘇聯佔領鄰國領土問題的提綱(稿)〉。
- ㉓ 李丹慧:〈毛澤東對蘇安全戰略思路的轉變〉, 載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 2016), 頁503-12。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對中蘇邊界問題的察覺還要早幾年。早在1960年11月, 中情局就注意到, 蘇共領導人的言論和中共媒體報導都顯示出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對立態度。參見“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3 November 1960), 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檔案, CIA-RDP79-00927A002900100001-1。
- ㉔ 〈毛澤東會見蒙古政府代表團談話紀要〉(1952年9月29日)·МУГХТА, ф.5, д.2, х/н.106, х.14-23。
- ㉕④① 〈毛澤東接見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時的談話紀要〉(1952年10月4日)·МУГХТА, ф.5, д.1, х/н.102, х.1-11。
- ㉖ 《外交通報》, 第95期(1964年7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 105-01897-03。
- ㉗ 〈蒙古反華報導、廣播反華聲明情況〉(1964年9月8日至10月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 106-01440-08。
- ㉘ 《外交通報》, 第126期(1964年9月1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 105-01897-03。
- ㉙ “Cable from Ambassador Katori to the Foreign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Visit to China (Conversation with Chairman Deng Xiaoping)’” (25 March 198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551>.
- ㉚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George H. W. Bush and Chairman Deng Xiaoping in Beijing” (26 February 1989),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507>.
- ㉛ “Information Note of Romanian Embassy from Beijing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3 May 1989), CWIHP Virtual Archive, <http://wwics.si.edu>.
- ㉜⑥②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252。
- ㉝④ 〈庫普里科夫給費德林的報告〉(1957年9月16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39, п.260, д.19, л.3-7。
- ㉞④⑦⑧⑨ 〈莫洛托夫與曾德會談紀要〉。
- ㉟⑤③ 〈周總理接見蒙古政府代表團談話記錄〉(1958年12月26日)·МУУТА(蒙古國中央檔案館), ф.310, д.1, х/н.13, х.15。
- 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頁320。
- 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頁181-82。
- ㊳ 〈周總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草稿)〉(1957年8月4日)·四川省檔案館, 建川001-01-1061。

- ④⑦ 蒙古國外交部第一局：〈按照協議來蒙古國的中國工人的有關事項〉（1968年7月7日），МУГХТА，ф.5，д.2，х/н.402，х.121-26。
- ④⑧ 谷繼坤：〈中國工人「赴蒙援建」問題的歷史考察（1949-1973）〉，《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4期，頁49-62。
- ④⑨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17, 83-85.
- ④⑩ “Record of Conversation with Prime Minister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Comrade Tsendenbal. (Fragments)” (29 November 195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479>.
- ④⑪ 〈拉哈姆蘇倫與中國駐蒙大使吉雅泰談話記錄〉（1950年9月1日），МУГХТА，ф.5，д.2，х/н.58，х.69-72；〈關於國務院關於動員工人參加蒙古生產建設的通知和指示及相關報告〉（1955年1月28日至3月26日），附件，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0048-01(1)。
- ④⑫ 〈同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團的談話和印發談話記錄的批語〉（1956年9月、12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17、221；217-18。
- ④⑬ 〈奧其爾巴特發來的電報〉（1956年9月26日），МАХНТА（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檔案館），ф.1，д.4，х/н.5。
- ④⑭ 〈澤登巴爾與周恩來談話紀要〉（1962年12月26日），МУГХТА，ф.5，д.1，х/н.816，х.1-20；〈周恩來總理同澤登巴爾主席第一次會談記錄〉（1962年12月2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3159-03。這兩份中蒙檔案在行文上略有不同，中方記錄沒有包括幾年前雙方就內蒙古人員問題通信的事實。
- ④⑮ 〈周恩來總理接見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魯布桑談話記錄〉（1964年10月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號暫缺。
- ④⑯ 〈關於國務院關於動員工人參加蒙古生產建設的通知和指示及相關報告〉，附件。
- ④⑰ “Excerpts from Tsendenbal’s Diary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Soviet Leader Anastas Mikoyan on Soviet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Ai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Fragments)” (24 February 1956),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480>.
- ④⑱ 〈列夫金等與謝甫生會談紀要〉（1959年10月22日），АВПРФ，ф.0111，оп.41，пор.10，пап.260，л.25-33。
- ④⑲ 〈莫洛托夫與澤登巴爾會談紀要〉（1960年6月1日），АВПРФ，ф.111，оп.42，пор.5，пап.264，л.51-56。
- ④⑳ 霍文：〈蒙古實施積極人口戰略〉，《人民日報》，2007年4月21日，第3版。
- ㉑ 有關研究參見成崇德：〈清代前期對蒙古的封禁政策與人口開發及生態環境的關係〉，《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頁26-31；張增智：〈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的歷史與現狀概述〉，《西北人口》，1995年第1期，頁10-22；Thomas Spoorenberg,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Fertility Change in Mongolia: Impressive Fertility Rise before Continued Fertility Decline”, *Demographic Research* 33 (October 2015): 841-70; Morris Rossabi,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25-45。
- ㉒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ummary Report on Organizing Ethnic Koreans and Mobilizing Korean Immigrants to Go to Korea to Take Part in Construction’” (10 December 1959),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177>.
- ㉓ “Instructions from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n Handling the Issue of Ethnic Koreans in the Northeast Going to Korea” (8 August 1963),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326>.

- ⑨ 沈志華：〈東北朝鮮族居民跨境流動：新中國政府的對策及其結果（1950-1962）〉，《史學月刊》，2011年第11期，頁69-84。
- ⑩ 參見阿澤吉爾嘎拉：〈20世紀蘇聯對蒙古國的影響〉，www.academia.edu/35593773；斯欽朝克圖：〈蒙古語言文字及蒙古語族語言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蒙藏季刊》，卷22（2013年3月），頁56-84；Arai Yukiyasu,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Language’: Language Policies of Mongolian Peoples in the USSR and Mongolia, 1920-1940”, in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lavic Eurasia and Its Neighboring Worlds*, ed. Osamu Ieda and Tomohiko Uyam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6), 309-34; Christopher Kaplonski, “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Socialist Mongolia”, *Central Asian Survey* 17, no. 1 (1998): 35-49。
- ⑪ 色·賀其業勒圖：〈論烏蘭夫貫徹民族語文政策的措施體系〉，《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7；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芻議〉，《語言與翻譯》，2002年第1期，頁28。
- ⑫ 轉引自周慶生：〈文字改換與社會政治變遷：中蘇兩國中亞地區透視〉，《中國社會語言學》，2005年第1期，頁178-79。關於謝爾久琴科在華期間的活動及影響，參見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李華鈺編：《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550-53。
- ⑬ 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載《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88。
- ⑭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芻議〉，頁28；周慶生：〈文字改換與社會政治變遷〉，頁180-81；色·賀其業勒圖：〈論烏蘭夫貫徹民族語文政策的措施體系〉，頁8-9。
- ⑮ 烏蘭夫：〈一九五九年的任務〉，載《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頁173。
- ⑯ “Iu. Andropov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On the Struggle with Lo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5 February 1958),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75896>.
- ⑰ 陳雲華、王春燕：〈當代新疆兩次重大文字改革芻議〉，頁30；周慶生：〈文字改換與社會政治變遷〉，頁180-81；色·賀其業勒圖：〈論烏蘭夫貫徹民族語文政策的措施體系〉，頁9。
- ⑱ 〈中共中央關於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957年10月15日），載中央檔案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269。
- ⑲ 新近的研究參見Anran Wang, “Between Communist Doctrine and Nationalist Agendas: Writing Reforms in Inner Mongolia, 1954-1980”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2017)。
- ⑳ 有關中國工人在蒙古捲入糾紛的情況，中、蒙、蘇檔案都有記錄。如前引〈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蒙古國外交部第一局：〈按照協議來蒙古國的中國工人的有關事項〉；以及〈周恩來總理接見蒙古駐華大使沙拉布談話記錄〉（1962年5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1383-01。
- ㉑ 〈澤登巴爾與周恩來談話紀要〉（1962年12月25日），МАХИТА, ф.5, д.1, х/н.283, x.1-7。
- ㉒ 有關國內學者對中蘇分裂原因的爭論，參見樂景河：〈「中蘇關係破裂原因」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33-45。